

文章编号:1005-0523(2011)04-0117-06

红色歌谣研究综述

温旭琼¹, 黄云莉²

(华东交通大学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 艺术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红色歌谣在历史、文学、传承和人物等领域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红色歌谣研究与现实生活互动的方向,实现研究空间拓展,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导向的现实介入。

关键词:红色歌谣;研究综述;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I277.2

文献标识码:A

红色歌谣是指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主要流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农村根据地,为广大根据地军民传唱的各种革命歌谣。从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以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为此,红军的宣传工作必须特别重视革命歌谣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且责成“各政治部负责征集编制表现各种情绪的革命歌谣”,标志着红色歌谣正式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在1934年1月共青团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编委会出版了《革命歌谣选集》,编者在后记做出了对红色歌谣的评论:“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来说,是极其单纯的;然而,它是农民作者自己的语句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如果把前者作为红色歌谣研究的一个明确的开端,而把后者作为对于红色歌谣理论评价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伴随革命形势的发展,红色歌谣唱响整个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红色歌谣的研究论述亦大量涌现;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各地党史部门和文艺界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红色歌谣的挖掘、收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并通过文艺宣传的途径与广播电影等视听手段嫁接,使得红色歌谣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建国后直至70年代,许多地方编辑出版了红色歌谣文集,在收集整理出版的基础上,红色歌谣的民族民间文化特性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红色歌谣研究进入发展阶段。学界依据各自研究范式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界定和研究。依据对其属性的界定,学界大体上是从文学、历史学(尤其是党史和革命史)、政治学、民俗学和传播学等各个视角加以研究。

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直到90年代,对于红色歌谣的研究因为种种原因陷入低谷,在此期间相关文章论著无论数量还是学术视野、探究深度都有所下降。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红色歌谣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红色歌谣研究发展的方向。

1 以往研究的综述

1.1 红色歌谣的历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红色歌谣研究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就是历史类研究。作为生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历史类研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为指导,探寻红色歌谣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内在逻辑脉络。此类研究以收集、整理集合出版为主要形式,尤其以党史文化研究为基础与核心。凌绍生^[1]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音乐活动,并结合苏区音乐活动的分期——初创时期、发展成长时期和繁荣昌

收稿日期:2010-12-25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Z0713)

作者简介:温旭琼(1972—),男,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

盛时期,对红色歌谣在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周少玲^[2]对苏区红色歌谣的发展进行历史划分,以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为界限,前者确定为红色歌谣兴起阶段,后者为蓬勃发展期;并结合红色歌谣的主题、题材分析了红色歌谣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余伯流^[3]概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红色歌谣展示和塑造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红色歌谣的发展构建革命精神的历史脉络。梅正强,^[4]张俊山^[5],姚莉苹^[6],左尚鸿的^[7],李树江^[8],杨莉^[9]、陈新建^[10]都是以遍布全国各地的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的历史发展和内容为对象,揭示出红色歌谣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色。在此期间,红色歌谣的结集出版和再版比以往(50—70年代)大为减少,主要有《闽西革命歌谣》,《红安革命歌谣选》,《扛着梭镖跟贺龙》(1988),彭佑明《湘鄂西苏区歌谣》,危仁最《江西革命歌谣选》。此类研究都是以收集、整理和订正出版为特色,对于保存红色歌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学界也开始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把握红色歌谣与其他民间歌谣之间的渊源。刘小兰^[11]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把握了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与客家民歌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两者在音乐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方面的异同之处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刘德等^[12]分析了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和自己成长的文化土壤——赣南闽西客家民山歌之间的联系,指出客家山歌是红色歌谣的母体和原生态,红色歌谣是民间叙事抒情这一传统体裁政治转化和嫁接的直接结果,突破了以往红色歌谣研究仅仅局限于革命史和政治话语的范畴,使得红色歌谣研究进入艺术发展史研究的视野。王予霞^[13]提出把握客家山歌的审美特性与政治宣传鼓动的契合性关系,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多向性角度看待苏区红色歌谣的发展。在《赣南、闽西客家歌谣的现代化历史进程》^[14]一文中。王予霞还从民间歌谣同中国歌谣学所建构的宏大叙事话语之间关系入手,把红色歌谣的进程看作是传统民间艺术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把红色歌谣的艺术发展史研究与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建立了关联。揭英丽^[15]还特别指出,以上“红色歌谣的研究为我们在文学现代化的背景中展开民间歌谣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例证”。

1.2 红色歌谣的音乐艺术类研究

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组成部分的红色歌谣,对红色歌谣的音乐艺术类研究,涌现出不少的成果。

1) 总体性研究。此类研究从总体上把握红色歌谣,并分析红色歌谣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研究的相互关系。曾遂今^[16]从总体上分析把握了作为革命斗争手段和武器的红色歌谣等革命音乐所具有的革命排他性、大众参与性、精神凝聚性和思想教育性,从音乐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方面把握红色歌谣的特性。明言^[17]从音乐批评的角度论述了20年代根据地的工农歌谣运动中政治指导与和音乐艺术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红色歌谣的研究纳入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理论构架之中。徐新建^[18]通过学界对红色歌谣是“拟民歌与伪民歌”认定过程产生学界的争论,把红色歌谣的发展与国学研究发展相联系,是近年来红色歌谣乃至民歌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

2) 艺术思想内容的研究。此类研究把握红色歌谣的表现内容的革命性,研究其艺术特色包括唱法和艺术表现手法,突出红色歌谣的思想内容。向柏松^[19]以土家族革命歌谣的歌词内容为视角,透视红色歌谣的思想内涵,凸显歌谣与革命历史斗争思想及其重要功能;胡建军^[20]以江西苏区时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为对象分析了苏区以红色歌谣为代表的音乐在题材选择和音乐创作中的特色,提出了保证革命音乐的传统和方向问题。皮晓彩^[21]专门论述了兴国革命山歌,突出了红色歌谣如何借鉴效果山歌的样式,包括独唱、领唱合唱、对唱、猜花等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内容。刘小兰^[22]结合红色歌谣《日头一出红彤彤》,《盼望红军回家中》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分析了作为客家山歌的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艺术形态特征中的节拍、节奏、衬词、衬腔和拖腔特点,以及演唱中的特点。王子韩^[23]论证了闽西红色歌谣在创作与表现手法上的形象性、夸张感、概括性强、独特的含蓄韵味和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戴彦敏^[24]重点介绍了红色山歌尤其是兴国红色山歌在曲式结构,调式音阶和节拍节奏上的艺术特征。以上艺术研究的具体成果,对于进一步彰显红色歌谣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美感都具有意义。

1.3 文学语言学研究

把红色歌谣作为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凸显出红色歌谣的民间文学性质,并把红色歌谣作为

语言学研究的文本,使红色歌谣的研究愈加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两篇论文分别是徐德培的《赣南苏区红色歌谣语言特色研究》(2005),桑俊的《红安革命歌谣研究》(2008)。他们分别从汉语言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两个红色歌谣富集地区中央苏区的赣南地区和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域红安的革命歌谣。徐德培着重论证了红色歌谣的用词和造句特点,突出了赣南红色歌谣用词中的口语、方言和古语词的使用;红色歌谣造句中善于运用常式句、短句、紧句和整句;在研究红色歌谣语言特色方面独具匠心。从民间文学方面来看,尤其是桑俊的《红安革命歌谣研究》把红色歌谣的研究与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理论、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资源的传播和现代价值研究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中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有较高的史料和资料价值,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现有的研究格局,对于红色歌谣后续研究有指导意义。

1.4 红色歌谣的文化研究

1) 文化意蕴研究。红色歌谣作为红色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实现了红色的革命理念与中国民族民间歌谣艺术的成功联姻。在“文”与“化”的联姻中构建了自身的语境和意蕴。在红色歌谣中“爱”和“恨”,“生”与“死”,“情”与“愁”,“小我”与“大我”这些传统民间歌谣的母题和思考,在轰轰烈烈的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中获得了全新的阐释。姚莉苹^[25]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对流传于湘鄂西土家族的红色歌谣《马桑树儿搭灯台》进行了文化解读,追溯了这首民间歌谣如何由明代民间夫妻别离情歌演化为红色歌谣,进而在当代的改编传承与流变的完整过程。重点分析了歌谣的思想文化内涵,凸显出红色歌谣中蕴含的“赤诚的革命之心,忠贞的夫妻之情,必胜的人生信念。”对于红色歌谣的此类研究还有姚莉苹^[26]的《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的特质》。

2) 文化价值研究。红色歌谣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对红色歌谣文化价值的研究开拓了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尹信^[27]的《兴国山歌在苏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吕莹全^[28]的《赣南民歌与苏区革命斗争》、《从赣南民歌看中央苏区时期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简华春^[29]的《右江革命歌谣与民众动员》,吴晓川^[30]的《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的歌谣建构与传播》都是从政治宣传鼓动功能上把握红色歌谣,把红色歌谣作为建构红色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加以解读。徐德培^[31]重点结合旅游中如何运用红色歌谣,探讨了红色歌谣的历史、教育和审美价值,并提出了在现代旅游活动中具体的运用模式。刘小兰^[32]以学校教育为取向,剖析在课堂教学中红色歌谣的德育功能和艺术价值。彭佑明^[33]结合《湘鄂西苏区歌谣》的文本分析了作为红色歌谣结集出版物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对于我们更好的发掘了红色歌谣的价值提供了思路。

1.5 传承和发展研究

对现实的反思是研究的基础,时下如何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是一个学界热点问题,红色歌谣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相应的成果。当下红色歌谣的传承与发展的现实令人喜忧参半。杨均^[34]论述了反映在将军之乡的鄂豫皖苏区的麻城乘马岗红色歌谣濒临失传。而在《江西兴国山歌:传唱不衰的艺苑奇葩》^[35]一文,兴国山歌中的红色歌谣借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培养山歌继承人,山歌文化进校园,挖掘整理传统山歌资源,开展群众山歌文化活动,使红色歌谣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焕发新生。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时下的传承发展研究中如何应对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主体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由于多种原因的作用下,在70末至80年代中期出现了发展和传承的低谷和转型期。如何使红色歌谣的学术研究,转型为传承和发展这一独特的文化形式,为构建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新焦点。黄明嫚^[36]提出了如何用档案工作的技术手段,通过文字、图表和声像对红色歌谣进行有效保存和档案式管理、运用,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规范问题,这是对目前行之有效的红色歌谣保存保护方式的研究论述。周友,陈建平^[37],将红色歌谣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结合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对策。桑俊^[38]具体以革命老区红安祝家楼村当前革命歌谣的传承进行了田野实证调查研究,尤其是独特的“村落传承”调查视角,开启了红色歌谣传承研究的新视野。

1.6 红色歌谣的人物研究

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红色歌谣的主体是与他密切相关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红色歌谣的生成传唱与创作者、演唱者(传播者)和听众(传播受众)密切相关。作为承载主体,红色歌谣的人物研究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大体可以有以下方面。

1) 红色歌谣的倡导者,以党的各级领导人物为代表,研究发掘他们对于红色歌谣产生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可归为历史类党史类别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吴直雄^[39]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对于红色歌谣的关注和具体的搜集活动,张军^[40]的《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贡献》。此外对重要党史人物的革命生涯研究中,尤其是和文艺活动密切相关人物例如瞿秋白,成仿吾等都直接参与了红色歌谣活动并且都创作了红色歌谣。比如《红安革命歌谣选》中就收录有鄂豫皖苏区重要领导人物郑位三订正的著名红色歌谣《黄安谣》和成仿吾创作的歌谣《识字运动歌》。

2) 红色歌谣传唱的代表人物,以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新老红歌手为研究对象,记述红色歌谣的创作者和传播歌手的生平、成长生涯和红色歌谣创作的具体过程和艺术成就,如刘繁荣^[41]的《最后的“红军女歌手”谢水莲》。这类研究现在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农村。尤其是2007年以来,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在走访革命老区的过程中,利用现代声像采录设备对于现在尚在人世的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歌谣传唱的歌手进行了抢救性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并有意识地发掘和推出红色歌谣的现代传承人物,包括传统民间歌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田野采风资料。但是放眼全国范围,湖北麻城红色歌谣传承老歌手因为年老故去,年轻一代能够记忆和传唱的极少,研究者们因为经费原因致使研究处于困境,桑俊的《革命歌谣的村落传承》对于湖北红安祝家楼村的实证调研,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这些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因为离开了红色歌谣的传承主体——人,红色歌谣的研究将失去宝贵的“活”的资料。

总之,各类专题研究不断推进对于红色歌谣的历史渊源、思想艺术内容、艺术表现特色和技巧等方面的理解,挖掘和阐释红色歌谣的文化意义,把人物研究和传承保护相结合,特别是红色歌谣的研究放置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现代化的视野中,对于我们开拓红色歌谣阐释和研究空间极有裨益。

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红色歌谣的研究,从史学、音乐、文学、政治功能、文化、歌手到传承研究,学术视野日益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从研究的广度看,现有研究成果还不能涵盖红色歌谣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成果集中在史学和文学上;从深度看,大多数研究者面对的是记录整理后结集出版的文本版的红色歌谣,集中表现为对文本的解析式的文学范式,从而难以把握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歌谣所具有的文学内涵和文化意蕴,特别是当我们拓展到以此考查红色歌谣独特的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时候,文本分析对于音乐的“乐音”的理解更是难于推进。如何实现红色歌谣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就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开拓更为广阔的研究发展领域。由此,我们可以对时下的红色歌谣研究的方向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2 未来研究的展望

2.1 研究空间的拓展

通过以上研究类别和成果的综合介绍,我们会发现,现阶段红色歌谣的研究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空间受制于研究者的理论视野,集中于历史、文学领域进行一般性描述和整理结集出版,还没能真正走出阅读文本和故纸堆,这样的研究导致红色歌谣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无法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接和互动,从而丧失理论学术研究对于红色歌谣现实传承与发展应该具有的前瞻性指导和理论观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研究门类的有益经验和成果,开拓自身研究空间拓展到田野。作为活态的音乐文化,红色歌谣的内容、表演、歌手、听众以及社会文化布景共同搭建起一个特定的“展演舞台”。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红色歌谣的形成、演述和流传的生活世界,在田野山林中聆听和领会那些口耳相传、世代传扬的歌谣,才能领悟到红色歌谣的口头文学特征。这种研究空间将不再不是单纯的田野描述,而是追寻田野中的文本,依据具体的表演场域(语境)对口头文学的创作、接受和传播进行研究,深入探讨红色歌谣独特的文化审美意境和传播形式。

2.2 研究方法的创新

1) 多视角研究。以往对红色歌谣的研究以及提出的保护措施,基本上都是从学者或者政府视角出发,造成红色歌谣传唱的主体严重缺席。红色歌谣的主体是歌手和听众,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对于红色歌谣所具有的文化自觉与否,对于红色歌谣的传承和发展是最为核心的力量。这一点可以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方法,对于红色歌谣承载主体,特别是歌手(传承人)的调查、研究、保护和传承。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全面认识口头文学的传承、传播和变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真切的民众的红色歌谣情结。

2) 跨学科研究。必须突破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于党史、文学语言学和音乐学学科障碍,实际上,在对红色歌谣的研究中,除了这些学科,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哲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美学、传播学和口头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充分汲取到相关学科的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提高研究的广度深度,建构学术高地,开拓具有创新方法的新领域。

3) 比较研究。将红色歌谣的研究放在特定的参照系中,可以比较红色歌谣与近现代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题材和形式,通过比较可以鉴别和发掘红色歌谣与其他音乐文化形式的联系和区别,例如红色歌谣与一般的民间歌谣,与前期的学堂乐歌,与同时代的上海城市音乐文化进行比较,充分运用活态的资料,才能更深入探索红色歌谣与其音乐形式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

2.3 研究导向的现实生活介入

红色歌谣作为一种特定革命战争年代生成于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广大军民传唱和喜爱的艺术形式,在今天被广泛关注和研究,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红色歌谣蕴含着当代社会生活亟盼的文化价值。因此红色歌谣的研究也必须实现研究导向的现实介入才能够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于实践的发展,江西卫视力推的“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举办和好评连连,就是要求我们能够将研究导向现实介入,否则将出现研究在指导地位和前瞻性上的严重失语。卢静,时玉柱^[42]访谈中提出的“红歌到底能够红多久?”的问题,就是对这一现实的思考。作为一种文化形式,随着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迁,红色歌谣必然存在着“传承”与“变迁”的两种对立统一的趋向,研究如何在传承性和变迁性的张力之间寻求以研究实现推动红色歌谣的发展,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探讨时下红色歌谣传承内在生命力与现实生活的契合性问题,也就是如何用红色歌谣的文化艺术生产满足当下人们文化精神需求的问题。其次,就是立足于这种契合,分析红色歌谣的生成的结构模式,总结其创作表演到传播的规律,探索如何用红色歌谣的“变迁”(创新和发展)对现实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推动问题,这是所有红色歌谣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和价值归宿。

时下中国的各类文化研究,无论从研究内容、视角还是方式方法上都进入了一个多元立体的时代。只有加强红色歌谣的研究,才能深入领略其如何在现代社会“传承”与“变迁”,才能理解红色歌谣为什么能够不断介入我们的生活世界,理解其在当下民众生活世界的意义,这不仅可以为理解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和资源提供一个文本,更是在现实文化生活中为未来创造一份独具魅力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的研究愿意看到的。

参考文献:

- [1] 凌绍生. 中央苏区音乐史话[J]. 中国音乐, 1987(3): 1-5.
- [2] 周少玲. 浅谈苏区的红色歌谣运动[J]. 党史文苑, 1995(1): 18-21.
- [3] 余伯流. 传承革命精神的艺术瑰宝——略论中国红歌的历史轨迹及其深远影响[J]. 声屏世界, 2008(2): 5-7.
- [4] 梅正强.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简论[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1984(2): 57-60.
- [5] 张俊山. 土地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谈谈苏区的革命歌谣[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1997(1): 19-24.
- [6] 姚莉苹. 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生成原因探析[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6): 111-113.
- [7] 左尚鸿. 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论[EB/OL]. (2007-02-19)[2010-08-01] 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31542.
- [8] 李树江. 简论陕甘宁边区的回族革命歌谣[J]. 民族文学研究, 1986(1): 49-54.
- [9] 杨莉. 赣南革命历史民歌渊源初探[J]. 景德镇高专学报, 2005(3): 57-59.

- [10] 陈新建. 浅议广西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歌谣[J]. 桂海论丛, 2000(6): 71-73.
- [11] 刘小兰. 赣南客家民歌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传承关系研究[J]. 人民音乐, 2007(5): 45-47.
- [12] 刘德, 曾岚玲, 刘茜莹. 客家山歌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孕育关系浅析[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1): 42-45.
- [13] 王予霞. 区域文化视野中闽西苏区诗歌运动[J]. 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9(5): 66-72.
- [14] 王予霞. 赣南、闽西客家歌谣的现代化历史进程[J]. 江西社会科学, 2002(7): 47-51.
- [15] 揭英丽. 客家山歌研究综述[J]. 民间文化论坛, 2006(4): 91-95.
- [16] 曾遂今. 论革命音乐[J]. 黄钟, 2003(1): 67-72.
- [17] 明言. 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 153-220.
- [18] 徐新建. 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88-94.
- [19] 向柏松. 论土家族革命歌谣的思想内容特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版, 1990(5): 10-14.
- [20] 胡建军. 江西苏区音乐创作的特色[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2): 52-58.
- [21] 皮晓彩. 试论兴国客家山歌的样式及特色[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4): 52-56.
- [22] 刘小兰. 赣南客家山歌的演唱艺术探索[J]. 中国音乐, 2008(2): 146-148.
- [23] 王子韩. 略论福建苏区红色歌谣的创作及其特色[J].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3): 18-21.
- [24] 戴彦敏. 赣南苏区红色山歌艺术形态研究[J]. 大舞台, 2010(6): 146-147.
- [25] 姚莉苹. 赤诚·忠贞·信念——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文化解读[J]. 湖南社会科学, 2009(2): 162-164.
- [26] 姚莉苹. 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的特质[J]. 湖南社会科学, 2010(4): 161-164.
- [27] 尹信. 兴国山歌在苏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作用[J]. 人民音乐, 2004(9): 39-40.
- [28] 吕萃全. 赣南民歌与苏区革命斗争[J]. 党史文苑, 2005(9): 19-20.
- [29] 简华春. 右江革命歌谣与民众动员[J].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3): 25-27.
- [30] 吴晓川. 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的歌谣建构与传播[J]. 文艺争鸣, 2010(20): 101-103.
- [31] 徐德培. 红色歌谣与旅游应用[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9): 151-153.
- [32] 刘小兰. 红色歌谣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J]. 江西教育科研, 2007(9): 40-41.
- [33] 彭佑明. 论《湘鄂西苏区歌谣》的史料与文学价值[J].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4): 33-35.
- [34] 杨均. 将军之乡红色歌谣濒临失传 抢救工程因经费搁浅[EB/OL]. (2005-04-27)[2010-08-01]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7/16236509759.shtml>.
- [35] 黄志勇, 梅珍. 江西兴国山歌: 传唱不衰的艺苑奇葩[EB/OL]. (2010-04-14)[2010-08-01] <http://www.yiyuanyu.org/hxqy/mgmy.html>.
- [36] 黄明嫒. 红色歌谣的档案式保护研究——以百色起义红色歌谣为例[J]. 百色学院学报, 2009(6): 127-130.
- [37] 周友, 陈建平. 赣南红色文化资源分析与保护研究[J]. 科技信息, 2008(34): 267-268.
- [38] 桑俊. 论革命歌谣的村落传承[J]. 文学教育: 下, 2009(5): 30-31.
- [39] 吴直雄. 毛泽东对民间歌谣的搜集与运用[J]. 民间文学论坛, 1995, (4): 58-62.
- [40] 张军. 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贡献[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05): 671-673.
- [41] 刘繁荣. 最后的“红军女歌手”谢水莲[EB/OL]. (2007-02-19)[2010-08-0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c4321010008e0.html.
- [42] 卢静, 时玉柱. “红歌”为何这样走红——三学者纵谈“红歌现象”[N]. 中国艺术报, 2007-11-02(4).

Progress on Revoluational Ballads

Wen Xuqiong¹, Huang Yunli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Art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ing the current studying situation of revolutionary ballads in some fields such as history, literature, heritage and characters in the late 1980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direc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volutionary ballad studies and the real social life so as to achieve the aims of expanding its studying space, innovating studying methods and intervening studying guidance.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ballads; studying review; studying direction